

【贾雯鹤】《山海经》两考

作者：[贾雯鹤](#) | [中国民俗学网](#) 发布日期：2010-01-21 | 点击数：1499

[内容提要] 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，其独特的篇章结构和它最初是与图画一相配而行有关。《山海经》书名中的“经”字并非经典之义，而是经界的意思。《山海经》产生的时代大致是在战国中期到战国末期这段时期内，是名副其实的先秦文献。

[关键词] 《山海经》；篇章结构；经典；语言风格

一、《山海经》的篇章结构

《山海经》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典籍，班固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为“《山海经》十三篇”，并将其列为“数术略”中“形法”类之首。全书篇幅不大，不到 3100 字，包括《山经》和《海经》两个部分。

《山经》分为《南山经》、《西山经》、《北山经》、《东山经》、《中山经》五个部分，故《山经》又称作《五藏山经》（或作《五藏山经》，藏、藏为古今字）。

《海经》分为《海外经》、《海内经》、《大荒经》三个部分。《海外经》包括《海外南经》、《海外西经》、《海外北经》、《海外东经》四个部分；《海内经》包括《海内南经》、《海内西经》、《海内北经》、《海内东经》四个部分；《大荒经》包括《大荒东经》、《大荒南经》、《大荒西经》、《大荒北经》、《海内经》五个部分。

如果稍微留意的话，就会发现《山海经》的篇章结构与众不同。除《大荒经》以下五篇外，其方位

展开顺序不是大家习知的东、南、西、北，而是南、西、北、东。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蒙文通先生曾经指出，《山海经》是古代南方（即古巴蜀和楚）人的作品，故在篇章安排上以南方为首。但是先秦典籍甚多，我们并未见到与此类似的事例，实难采信。

原来，《山海经》作为主记山川道里的地理书，其方位顺序与我国早期地图的方位顺序是一致的。从出土资料来看，早期地图的方向并非现在的地图那样“上北下南”，而是有“上南下北”的，“例如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《兆域图》，马王堆汉墓出土的《地形图》、《驻军图》、《禹藏图》和《阴阳五行》的插图等等，它们就都是以‘上南下北’为正”。同样，《山海经》的这种南、西、北、东的方位顺序亦当与“上南下北”的地图方位有关。

这种独特的篇章结构安排，可能古经就是如此，刘秀校录《山海经》时，遵依旧章，未作改动。刘秀《上山海经表》云：“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《山海经》，凡三十二篇，今定为一十八篇，已定。”今传本亦为十八篇，表面上看来，今传本就是刘秀校录本。实则不然。袁珂先生《山海经校注》于《大荒东经》下云：

明《道藏》本目录，《海内经》第十八之下注云：“本一千一百十一字，注九百六十七字。此《海内经》及《大荒经》本皆进在外。”“进在外”或作“逸在外”。疑此皆郭璞注语。毕沅云：“郭注本目录下有云：‘《海内经》及《大荒经》本皆进在外。’案此经末又无建平校进款识，又不在《艺文》十三篇之数，惟秀奏云：‘今定为十八篇。’详此经文，亦多是释《海外经》诸篇，疑即秀等所述也。”郝懿行云：“据郭此言是此以下五篇皆后人所述也，但不知所自始，郭氏作注亦不言及，盖在晋以前，郭氏已不能详矣。今考本经（《海外》、《海内》各经——珂）篇第，皆以南西北东为叙，兹篇以后，则以东南西北为次，盖作者分别部居，不令杂厕，所以自别于古经也。又《海外》《海内经》篇末皆有‘建平元年四月丙戌’已下三十九字，为校书款识，此下亦并无之。又此下诸篇，大抵本之《海外、内》诸经而加以诠释，文多凌杂，漫无统纪，盖本诸家记录，非一手所成故也。”毕、郝之说近是。唯谓《荒

经》以下五篇为诠释《海外、内》各经文字，尚有未协。盖兹五篇古本别行，成书当不在《山经》及《海外、内》各经之后。以未经整理，故文多凌杂无统纪。然乃愈见其古朴，确属刘秀校书时“进在外”或“逸在外”者，谓为“秀等所述”则诬矣。

可见，《大荒经》以下五篇原本不在刘秀校进本《山海经》之列。因此《大荒经》的方位顺序与其他诸篇不同，究其原因，应该是经过了后人的改动、调整。其改动、调整的时间，当是在刘秀之后、郭璞之前。

实际上，《山海经》不仅与地图颇有关联，而且与图画有关。根据文献记载来考察，《山海经》最初是有图的。

晋代诗人陶渊明《读〈山海经〉十三首》第一云：“泛览《周王传》，流观《山海图》。”可见，陶渊明还曾看到过《山海图》。为《山海经》作注的郭璞应该也曾见过《山海图》，这从《山海经》的郭璞注中就可见出。

《山海经·海外南经》：“羽民国在其东南，其为人长头，身生羽。”郭璞注：“能飞不能远，卵生，画似仙人也。”

《海外南经》：“箍头国在其南，其为人人面有翼，鸟喙，方捕鱼。”郭注：“画亦似仙人也。”

《海外南经》：“厌火国在其国南，兽身黑色，生火出其口中。”郭注：“言能吐火，画似猕猴而黑色也。”

郭璞引图画作注，可见其亦能见到《山海图》。凡此都足以证明《山海经》最初是和图相配而行的。正因为《山海经》是和图相配而行，所以《山海经》的正文显得十分简略。古人可以见图知意，今人见不到图画，难免有语焉不详之叹。

古本《山海图》之所以失传，可能与早期的图画大都绘制在帛上有关。帛为丝织品，不易保存，故而失传。

下面再谈谈《山海经》的书名问题。

《山海经》的书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，以为是人们将它奉为经典，故有是称，犹如《诗经》、《易经》、《书经》等称“经”一样。实则不然，《山海经》之“经”并非经典之谓。对此，袁珂先生《山海经校注》有详细论证：

《山海经》之“经”，乃“经历”之“经”，意谓山海之所经，初非有“经典”之义。《书·君奭》：“弗克经历。”注：“不能经久历远。”此“经历”连文之最早者也。《孟子·尽心下篇》：“经德不回。”注：“经，行也。”犹与“经历”之义为近。至于由“常”、“法”之“经”引申而为“经典”之“经”乃较晚矣。《史记·大宛传》称“《禹本纪》、《山海经》所有怪物，余不敢言之”，《山海经》之名见于载籍者始此。以好奇如司马迁者，尚以此书与《禹本纪》（已佚）同列而谓“不敢言之”，其在彼眼光中为过于荒怪之书可知。则《山海经》乃其固有之名，非后人亦非史公以其重要而特尊之为“经”也。考先秦典籍之称经者唯墨家书，《庄子·天下篇》：“苦获、已齿、邓陵子之徒，俱诵《墨经》。”是其证。今《墨子》篇目中有《经》与《经说》，墨书之称经盖有由矣。然孙诒让《墨子闲诂》犹谓此数篇为“战国之时，墨家别传之学，不尽墨子之本旨”。《管子》书前九篇亦称“经言”，以下各篇，称“外言”、“内言”、“短语”、“区言”、“杂篇”等，似已具经传并收之体例，然犹未径以“经”名。儒家书如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等，虽后世均特尊之为“经”，而在称引《山海经》之太史公书中，则尚未著“经”字（见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。《庄子·天运篇》虽有“孔子谓老聃曰：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六经”语，然说者多谓是后人所属，殆不足凭信。观乎此，则《山海经》尤以其中成书较早之《五藏（藏）山经》（约成于战国时代）之称“经”，其非“经典”而只是“经历”之意，亦可以明矣。

袁先生谓《山海经》之“经”非“经典”之义，可谓确论。然谓“经”为“经历”之义，作为书名，颇感不协。壹学诚《文史通义》卷一“经解中”云：

《孟子》云：“行仁政必自经界始”，地界言经，取经界之意也。是以地理之书，多以经名。《汉志》有《山海经》，《隋志》乃有《水经》，后代州郡地理多称《图经》，义皆本于经界。书亦自存掌故，不与著述同科，其于六艺之文，固无嫌也。章氏所说“经”为“经界”之义，作为书名，较之“经历”之义，更显允当。所谓经界，就是疆界、界限的意思。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：“夫仁政必自经界始，经界不正，井地不均，谷禄不平。”赵岐注：“经，亦界也。必先正其经界，勿侵邻国，乃可均井田，平谷禄。”焦循疏云：“赵氏以此经界即各国之疆界。”正经界之事历来为治理国家之要务，即《汉书·食货志上》所云：“理民之道，地著为本。故必建步立晦，正其经界。”这或许也是《山海经》、《水经》等地志图经产生的原因之一。

综上所述，我们可以明白，《山海经》书名的含义就是指山海的经界。

二、《山海经》的作时

对于《山海经》的产生时代，学者大都根据文献本身和语言风格来判定。

蒙文通先生《略论〈山海经〉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》是较早一篇根据文献本身来探讨《山海经》产生时代的论文。经过论证，他认为《山海经》并非一时之作，其中《大荒经》部分的写作时代最早，大致在西周前期；《海内经》部分稍晚，在西周中期以前；《五藏山经》部分最晚，但也在公元前四世纪以前。

袁珂先生《〈山海经〉写作的时地及篇目考》则认为《山海经》三个部分以《大荒经》四篇和《海内经》一篇成书最早，大约在战国初年或中年；《五藏山经》和《海外经》四篇稍迟，是战国中年以后的作品；《海内经》四篇最迟，当成于汉代初年。

蒙、袁二先生从文献本身考察《山海经》的时代，得出的结论颇有差异。事实上，如果不是有意模仿的话，最能反映一个作品时代的应该是其语言风格。当然，《山海经》并不存在有意模仿的问题。假如能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考察，其结论应该更为可靠。卫聚贤先生《山海经的研究》主要就是从语言中的语法和文献两方面入手来考察《山海经》的产生时代。卫先生认为《山海经》的语法特点有二：

（一）数目中无“又”字

“凡十山，二千九百五十里。”（《南山经》）

“凡十九山，二千九百五十七里。”（《西山经》）

“凡二十五山，五千四百九十里，”（《北山经》）

“凡十二山，三千六百里。”（《东山经》）

“凡十五山，六千六百七十里。”（《中山经》）

它里边不作“十又九山”“二十又五山”，作“十九山…‘二十五山’，少一个“又”字，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。

（二）介词多一“以”字

“自太行之山以至于无逢之山。”（《北次三经》）

“自楸（朱虫）之山以至于竹山。”（《东山经》）

它里边不作“自……至于……”，作“自……以至于……”，多一个“以”字。它是战国中年的作品。

卫先生首先从《山海经》的语法特点判断其是战国中年的作品。其次，他再从《山海经》与同时期文献递衍借鉴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其时代，从而认为：

《山海经》的作期，在《穆天子传》后，《论语》《晋语》《周书》《庄子》《楚辞》《吕氏春秋》《淮南子》前。按《穆天子传》是西元前 408 年后的作品，《论语》《晋语》是西元前 336 年前的作品，是《山海经》的作期在西元前 408 后 336 年前这七十二年间。折中计算是西元前 372 年左右，即战国中年作品。

卫先生从语言和文献两方面都证明《山海经》是战国中年的作品。

那么，上面提到的《山海经》的两个语法特点是否就是战国中期文章特有的现象呢？著名语言学者洪诚先生《读〈周礼正义〉》一文认为：

从语法看，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，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“有”字连之，战国中期之文耶不用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仪礼》经文、《易·系辞传》皆必用。《穆天子传》以用为常。《王制》、《庄子》不定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以不用为常。《山海经》中之《五藏山经》不用。《孟子》除论述与《尚书》有关之事而外亦不用。

可见洪先生亦认为战国中期之文，十数与零数之间已不用“有”字连之。《山海经》中之《五藏山经》不用，则《山经》的上限当为战国中期。

王晖先生《古文字中计数使用“又”字的演变及其断代作用考》一文，详细考察了古文字中计数使用“5L'’（或“有”）字的发展演变情况，认为：“凡是作品中均用‘又’或‘有’的，其时代不会晚于战国中期前段（前 390—340）；凡是作品中全不用‘有’的，其时代不会早于战国前期。”从而印证了卫、洪二先生所说的正确。

此外，王建军先生《从存在句再论〈山海经〉的成书》一文，主要从《山海经》全书所表现出来的鲜明而独特的语用风格入手，全面考察了《山海经》的所有处所存在句的构型特点和分布情况。认为《大荒

经》以下五篇产生时代最早，它和《海外》诸经大致成于战国；《山经》部分内容成于战国，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；《海内》诸经则为秦汉之作。王先生所论大致不差，唯谓“《山经》部分内容成于战国，大部分为秦汉人增补”，则犹有可商之处。因为《山经》之文，先秦典籍已多所称引。仅就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而言，称引《山经》之文就达8处之多：

（一）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：“肉之美者：猩猩之唇，獾獾之炙。”

《山海经·南山经》：“又东三百里曰青丘之山，……有鸟焉，其状如鸠，其音如呵，名曰灌灌。”灌灌，郭注：“或作澩澩。”郝懿行疏：“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云：‘肉之美者，獾獾之炙。’高诱注云：‘獾獾，鸟名，其形未闻。獾一作灌。’今案：灌与澩、澩与澩俱字形相近，即此鸟明矣。”可知《本味》之“獾獾”即《南山经》之“灌灌”。

（二）《本味》：“醴水之鱼，名曰朱鳖，六足，有珠百碧。”

《东山经》：“又南三百八十里，曰葛山之首，无草木。澧水出焉，东流注于余泽，其中多珠鳖鱼，其状如肺而有目，六足有珠，其味酸甘，食之无疴。”郝疏：“《吕氏春秋》作‘朱鳖’，郭氏《江赋》作‘赫鳖’，是经文珠朱、鳖鳖并古字通用。”可知《本味》之“朱鳖”即《东山经》之“珠鳖”。

（三）《本味》：“菑水之鱼，名曰鰩，其状若鲤而有翼，常从西海夜飞，游于东海。”

《西山经》：“又西百八十里，曰泰器之山。观水出焉，西流注于流沙。是多文鰩鱼，状如鲤鱼，鱼身而鸟翼，苍文而白首赤喙，常行西海，游于东海，以夜飞。其音如鸾鸡，其味酸甘，食之已狂，见则天下大穰。”郝疏以“观水”、“文鰩鱼”即《本味》之“菑水”、“鰩”。

（四）《本味》：“菜之美者，昆仑之苽。”

《西山经》：“西南四百里，曰昆仑之丘……有草焉，名曰黄草，其状如葵，其味如葱，食之已劳。”郭璞即引《本味》文以作注，可知郭氏以“黄草”即《本味》之“苽”。段玉裁《说文解字注》于“黄”字下云：“黄、苽古今字”，亦可知二者实一。

（五）《本味》：“和之美者：阳朴之姜，招摇之桂。”

《南山经》：“《南山经》之首曰昔佳山。其首曰招摇之山，临于西海之上，多桂。”郭璞即引《本味》文以作注，可知二者为一。

（六）《本味》：“水之美者：……沮江之丘，名曰摇水。”

《西山经》：“又西三百二十里，曰槐江之山……爰有淫水，其清洛洛。”槐江之山，郝疏：“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云：‘水之美者，沮江之丘，名曰摇水。’疑沮江即槐江。”爰有淫水，其清洛洛，郭注：“水留下之貌也。淫音遥也。”郝疏：“陶潜《读山海经诗》云‘落落清瑶流’，是洛洛本作落落，淫本作瑶，皆假借声类之字。陈寿祺曰：‘淫无遥音，经文淫字必传写之讹。’当是也。瑶水即瑶池，《史记·大宛传》赞云：‘《禹本纪》言昆仑上有醴泉、瑶池’，《穆天子传》云：‘西王母觞天子于瑶池’是也。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又作‘摇水’，并古字通用。郭注‘留’当为溜或流字。”淫水，《四部丛刊》本、毕沅校本、《百子全书》本《山海经》并作淫水，淫当为潘字之形讹，犹如《方言》卷十：“女、惕，游也。”戴震注：“媚多讹作媼，曹毅之本不误。”堪为之比。潘、瑶、摇并音近字通。可知“媼槐江之山”、“淫（潘）水”即《本味》之“沮江之丘”、“摇水”。

（七）《本味》：“水之美者：……高泉之山，其上有涌泉焉，冀州之原。”

《中山经》：“又东南五十里，曰高前之山。其上有水焉，甚寒而清，帝台之浆也，饮之者不心痛。”郝疏：“《吕氏春秋·本味篇》云：‘水之美者，高泉之山，其上有涌泉焉。’即此。泉、前声同也。”《左传·昭公二十二年》：“晋箕遗、乐征、右行诡济师，取前城。”《水经注·伊水》引服虔云：“前读为泉，周地也。”可为郝说之证。

（八）《本味》：“果之美者：沙棠之实。”高诱注：“沙棠，木名也。昆仑山有之。”

《西山经》：“西南四百里，曰昆仑之丘……有木焉，其状如棠，黄华赤实，其味如李而无核，名曰沙棠，可以御水，食之使人不溺。”郭璞亦引《本味》文作注，可知二者实一。

《山经》为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所称引者，几乎遍及《山经》各篇，因此，《山经》成书至迟应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前。换言之，其下限当为战国末年。

综合诸家所论，我们认为袁珂先生之说最为可取。只是袁先生以为《海内经》四篇成于汉代初年，未免下推过晚。

张永言先生《训诂学简论》在论及《尔雅》采自书本的材料时说：“《释水》云‘河出昆仑虚’，此取《山海经》之文也。”并于此下作注云：“《山海经·海内西经》：‘海内昆仑之虚，在西北帝之下都。’

《水经注·河水一》引《山海经》：‘昆仑墟在西北，河水出其东北隅。’”《尔雅·释水》此条采自《海内西经》，而《尔雅》的成书年代，据何九盈先生的看法，是战国末年，则《海内西经》犹在此前。

无独有偶，《吕氏春秋·本味》所谓：“水之美者：三危之露，昆仑之井”，实亦本之于《海内西经》之文。《海内西经》：“海内昆仑之虚……面有九井，以玉为槛。”郝疏即引《本味》作注，可知二者实一。因此，《海内西经》当在《吕氏春秋》之前。

虽然我们未能遍考《海内经》四篇被称引的情况，但从《尔雅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已经称引其中的《海内西经》来看，似亦足以说明《海内经》四篇成书的下限当为战国末年。

上面我们对《山海经》的作时作了考察，知道《山海经》并非一时之作。其上限当是战国初年或中年，下限当是战国末年。要之，《山海经》为先秦文献，可无疑矣。虽然《山海经》在流传过程中，可能有后人的踵事增华，这在其他先秦文献中，亦不鲜见，但正如《颜氏家训》卷6《书证》所云：“或问：‘《山海经》，夏禹及益所记，而有长沙、零陵、桂阳、诸暨，如此郡县不少，以为何也？’答曰：‘史之阙文，为日久矣；加复秦人灭学，董卓焚书，典籍错乱，非止于此。……皆由后人所羸，非本文也。’”颜之推以为“长沙”等地名为“后人所羸，非本文也”，甚是。长沙、零陵见于《海内经》：“南方苍梧之丘，苍梧之渊，其中有九嶷山，舜之所葬，在长沙零陵界中。”“在长沙零陵界中”一句，蒙文通、袁珂先生以为是后人释语羸人经文者。又《逸周书·王会解》：“路人大竹，长沙鳖”，可见长沙本为先秦地名。诸暨不见于今本《山海经》，徐鯤云：“‘诸暨’当为‘余暨’，《海内东经》云：‘浙江出三天子都，在其东，在闽西北人海，余暨南。’”实际上，桂阳、余暨皆见于《海内东经》末尾“岷三江首”以下一段文字。这段文字与全书体例颇多不合，毕沅云：“自‘岷三江首’已下，疑《水经》也。《隋书·经籍

志》云：‘《水经》二卷 3，郭璞注。’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云：‘《水经》二卷，郭璞撰。’此《水经》，隋、唐二志皆次在《山海经》后，又是郭注，当即此也。”毕说甚是，袁珂先生亦从之，则此段文字为羸入的郭注《水经》，可无疑矣。由此可见，《颜氏家训·书证》所谓“长沙”等地名皆为后人羸入之文，亦可见颜氏所论极是。因此，《山海经》纵有后人羸入之文，仍无妨其为先秦文献。（附记：谨以此文纪念袁珂先生诞辰 90 周年。）

（原文载于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06 年第 04 期）